

文艺风云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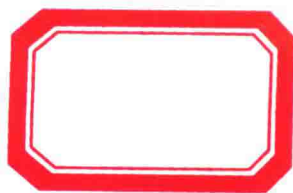
河南大学出版社

刘锡诚 著



在文坛边缘上

——编辑手记



文艺风云书系

刘锡诚 著

在文坛边缘上

——编辑手记

河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刘锡诚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81091-143-0

I. 在… II. 刘… III. 当代文学—文学史—史料—中国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2858 号

出 版 人:王刘纯

责任编辑:袁喜生

责任校对:和彩霞

责任印制:苗 卉

装帧设计:张 胜

出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E-mail: bangong@hupress. com

经 销 河南省新华书店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39.25

字 数 565 千字

印 数 1—3000

ISBN 7-81091-143-0/I·226

定价:5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文坛的早春(1977).....	(1)
重回文艺界.....	(1)
何其芳的逝世	(10)
第一次接触广州文艺界	(18)
短篇小说座谈会始末	(23)
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	(37)
第二章 新时期文学的兴起(1978)	(60)
关于 30 年代文艺的争论.....	(61)
对《严峻的日子》等的批判	(70)
出差武汉三镇	(74)
遭遇忠言	(79)
闯开写知识分子题材的禁区	(82)
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	(85)
文联全委扩大会与文联各协恢复活动	(89)
凤凰涅槃:《文艺报》复刊.....	(97)
《伤痕》的发表.....	(102)
“伤痕文学”作为概念.....	(104)
第三战役:对准“文艺黑线”论	(109)
繁荣短篇小说创作成为关注重点.....	(113)
沉闷的长沙文艺界.....	(114)
二访广州.....	(119)

三刊编委会与真理标准讨论·····	(126)
为作家作品平反·····	(154)
广东文学座谈会的召开与“新时期文学”词语考释·····	(181)
启动短篇小说评选活动·····	(184)
第三章 大辩论与大前进(1979)·····	(193)
思想解放的锣鼓·····	(193)
为“四五”诗歌正名·····	(196)
长篇小说作者亟待冲出思想牢笼·····	(203)
一篇来稿引出的一个故事·····	(206)
茅盾的一封信引起的·····	(213)
评委们对短篇评奖作品各抒己见·····	(214)
文学理论批评座谈会·····	(218)
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法国·····	(249)
重提“写中间人物”旧案·····	(252)
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讨论·····	(255)
解冻文学?·····	(263)
《为文艺正名》引起争论·····	(269)
《向前看呵!文艺》引起争论·····	(275)
短篇小说《我应该怎么办》及其反响·····	(279)
“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	(282)
《文学:回忆与思考》的征稿·····	(284)
《“歌德”与“缺德”》风波·····	(291)
短篇小说《重逢》引起争议·····	(294)
《文艺情况》创刊·····	(297)
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300)
风景这边独好·····	(306)
《电影工作简报》事件·····	(311)
列席上海文艺创作会议·····	(314)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成立和部分期刊主编会议·····	(324)
公开清算《纪要》的时机到了·····	(335)

“十七年”和“三年”	(337)
《乔厂长上任记》事件	(339)
“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终结	(347)
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作品引起关切	(352)
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359)
长篇小说读书会	(362)
无政府主义思潮	(368)
第四章 与人民同呼吸(1980)	(371)
创作扫描	(371)
樊骏来信谈《黄河东流去》	(375)
公刘评顾城	(376)
黄秋耘评张洁引起非议	(378)
《收获》第一期推出四个中篇	(380)
剧本创作座谈会	(382)
李子云来信	(384)
青年诗人熊召政为民请命	(386)
《文艺报》1980年工作要点	(388)
宋遂良来信	(394)
文学,要关注九亿农民	(396)
周扬、沙汀推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410)
贵州文坛纪事	(412)
成都七日	(420)
到简阳访周克芹	(425)
重庆文坛掠影	(428)
对形势的忧虑	(431)
《文艺报》举办第二次长篇小说读书会	(432)
文艺局给我们出题目	(434)
张光年约谈《文艺报》改版问题	(435)
贺敬之谈文艺形势	(439)
关于中篇小说《人到中年》	(440)

反封建主义与反官僚主义·····	(442)
《当代女作家作品选》的遗憾·····	(443)
正式宣布《文艺报》改版·····	(448)
对《文艺报》的批评·····	(450)
老作家蹇先艾的品德·····	(452)
王蒙刮起创新风·····	(454)
青年文学创作会议推迟召开·····	(461)
何士光及其《乡场上》·····	(462)
中篇小说评奖做出决定·····	(465)
上海作协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	(467)
访江苏文学界·····	(476)
写农村题材的困惑·····	(479)
沙叶新文章惹了点事·····	(481)
领导核心的分歧·····	(482)
文坛动向令人关注·····	(486)
唐祈评公刘·····	(488)
当代文学讨论会在昆明召开·····	(489)
唐因谈文艺思想上的两种倾向·····	(497)
要发出时代的声音·····	(498)
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名单确定·····	(501)
第五章 在风雨中跋涉(1981) ·····	(502)
《文艺报》改版·····	(502)
鼓浪屿会议·····	(504)
温小钰：“我们还是肯定得太少”·····	(506)
邀黄秋耘开专栏·····	(509)
姚芳藻约我为《中国百科年鉴》撰稿·····	(511)
喜读张弦《未亡人》·····	(512)
散文家岑桑·····	(515)
蹇先艾著文评何士光·····	(517)
党员领导骨干会议·····	(519)

周良沛评邵燕祥·····	(525)
顾尔鐔《也谈突破》挨批·····	(528)
与包川讨论新作·····	(530)
家乡文事·····	(534)
中篇小说评奖启动·····	(537)
陈辽论农村题材小说·····	(543)
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546)
与柳溪的结识·····	(547)
文学新人孙健忠·····	(549)
任白戈为《徐懋庸选集》写序·····	(550)
两面夹击·····	(551)
送别茅盾·····	(553)
张庆田评汤吉夫·····	(554)
《苦恋》事件·····	(556)
周扬召集专门会议研究《文艺报》问题·····	(562)
新诗评奖:《诗刊》拒绝刘白羽的信·····	(564)
艾芜第三次南行·····	(571)
三项文学评奖颁奖大会·····	(573)
“不能不偏不倚”·····	(577)
云南作家群声援冯牧·····	(579)
湖南作家群·····	(580)
向作家进一言·····	(583)
反自由化·····	(586)
中国文联召开座谈会·····	(589)
青年评论家谢望新·····	(590)
获奖中篇小说集出版问题·····	(593)
困惑的情绪·····	(595)
二唐《论〈苦恋〉的错误倾向》发表·····	(602)
继续倡导农村题材创作·····	(603)
关于文艺评论的一封信·····	(606)

小说《初春》遭冷遇·····	(608)
担心思想解放运动的成果被否定·····	(611)
要振奋精神·····	(613)
戴厚英的《人啊,人》·····	(614)
《小说创作漫评》出版·····	(617)
赴香港参加现代文学研讨会·····	(618)
后记·····	(621)

第一章

中国文坛的早春

(1977)

对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被彻底砸烂、被重创的文艺界来说,1977年,无疑是开始复苏的一年。尽管在涉及政治的问题上,人们还噤若寒蝉,但毕竟呼吸到早春的气息了!作家艺术家们互相舐舔着身上的伤痕,强压下悲愤的叹息,在会心的微笑中,开始捡拾已经生锈的武器,准备重新回到十年前“犁庭扫院”时被扫下来的那个舞台上。但,除了内外伤痕亟待平抚外,谁都痛切地感到丧失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人都无在无言的沉默中变老了!古训有云,“哀莫大于心死”,这才是中国作家最大的悲哀!我在这一年当中也回到了文艺岗位,亲历和目睹了中国文学艺术发展史上的一段历史。作为一个见证者,一个小小的编辑,在这里,我将尽可能忠实地从个人的角度记下我所看见的和经历的一些事情。

重回文艺界

我是1971年10月从天津静海团泊洼文化部“五七干校”第一批

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的七个人中的一个。^①我大学毕业后就在中国文联工作,习惯了文艺界那种比较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秩序,尽管在“文革”中尝够了“文化工作危险”论之苦,尽管在新华社这样被人羡慕的中央新闻单位工作,并且尝试做过翻译、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却还是感到不很适应新闻单位的严格纪律和刻板的生活,于是就斗胆地向社里的各级领导提出申请并终于获准于1977年6月底离开前后工作了七年之久的新华社,重回阔别了多年、正在重建中的文艺界。

正确地说,虽然《诗刊》、《人民文学》、《人民戏剧》、《人民电影》、《中国摄影》等几家刊物已经陆续复刊,但分属于出版局、国务院文化组、新华社等单位管辖;而“文革”中被撤销了的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摄影艺术联谊会,都还没有恢复工作;“文革”前的许多知名文艺工作者都还没有分配工作,有的还没有做出政治结论;所以应该说,“文革”结束后的新的文艺界,还没有真正形成。

我到东四八条52号《人民文学》杂志社报到的时间是1977年7月7日。《人民文学》杂志社所在的这栋楼,“文革”前我就很熟悉,原来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办公楼。进门的影壁上,写着毛泽东专为该院成立题写的“百花齐放 推陈出新”八个飘逸洒脱的毛体大字。1957年秋天,我的同乡和同学董润生从北大中文系毕业慕名而来,先后投到张庚、傅惜华的门下,所以我也常来此地闲谈。“文革”之始,在混乱之中我也曾不止一次来此楼内看过大字报。相逢何必曾

① 其他六人是:陈大斌,原来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干部,后来先后任新华社国内部农村组的组长、《瞭望》杂志第一任总编辑;方杰,原来是中国电影联谊会的干部,到新华社后被任命为国内部文教组的组长,不久离开新华社担任了《人民电影》杂志的副主编,后调任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郭玲春,原来是电影剧本创作室的干部,后来成为新华社国内部文教组的著名记者;苟玉生,原来是电影剧本创作室的干部,分配在新华社国内部,不久病逝;殷可善,原来是中国曲艺研究会的干部,到新华社后调西藏分社任记者;另一位调任新华社国内部政治组任编辑记者,名字记不起来了。

相识！我所供职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和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工作人员，于1969年9月30日（据传，不让这些人在京过二十周年国庆节）被一锅端，用几辆大卡车把我们从首都北京拉到了河北省怀来县官厅水库北沿的一片荒滩上，在此安营扎寨，从此开始了“五七干校”知识分子劳动改造的生涯。在文化部所属的这所“五七干校”里，上述三个单位组建为一个连（第三连）。我们从此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我的下放干校有一番曲折的过程，需要在这里交代一下。干校的第一个地点是官厅水库北沿的荒滩上。在那里过了不到半个月，我便接到妻子单位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军宣队的电报，要我火速回京。我像是被装在闷葫芦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到京后，姓薛的军宣队首长向我宣布：“文化部干校不准带家属，现在你跟着（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干部到河南罗山干校去。今后你的工作由我们负责了。”不容分说，我乘坐丰沙线火车星夜赶回文化部干校，向领导们说明事情原委后，拿了行李再往北京赶。按军宣队的指示，在规定的五天内，把所有的家当处理干净，把一部分书籍七分钱一公斤当废纸卖给收破烂的，一部分运到建内五号文学所的资料室暂存，把和平东街3号楼的住房也交出去，拖儿带女，随着学部的下放队伍一起，乘南下的火车，去了河南省信阳地区明港的一个军事学校，稍事停留后，又转道去罗山干校。从信阳乘长途汽车到罗山，但见公路两旁，迤邐于途都是一排一簇的小坟头，像些小土堆，那就是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直折腾到1960年开始的三年困难中发生的著名的“信阳事件”中饿死的农民们的葬身之处，为此事件，党中央曾发了专门的文件。到1979年读了河南作家张一弓写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才知道那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罗山有一个很大的劳改农场，我们的干校就是这个劳改农场的一部分。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为什么，干校又迁移到息县东岳公社的一个荒滩上。我在那里一直呆到了1971年6月。我属于那种“人还在、心不死”的人，对于国家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就这样甩包袱不要了，真有点儿于心不甘，于是我向学部干校的领导提出回文化部干校的请求，并得到了批准。

我带着我的小儿刘方离开息县东岳公社，回文化部干校去。妻子和她年迈的母亲退休教师黄惠连先生，带着女儿刘青继续留在息县学部干校。这时，文化部干校已从官厅迁移到宝坻，在宝坻还没有站住脚，再次迁移到天津南郊的团泊洼滩涂地带。我带着儿子背着行李从信阳上车，途经北京转车到天津，因在北京的宿舍已经为他人所住，没有落脚一夜的地方，只好央求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的留守公务员打开资料室的门，在资料室的水泥地板上借住了一夜。到了团泊洼干校，我这个“文革”中的修正主义苗子“黑线人物”竟然又被军宣队看中，叫我代替年逾古稀的戏剧理论家晏甬老前辈，担任了三连连长，管一连人的吃喝拉撒睡并带领大家劳动生产。我接受这份重托，每天背着当时才五岁的儿子下田干活。由于分工只管吃喝拉撒睡和劳动生产，不管政治运动（由副连长、戏剧史家郭汉城分管），而且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阶段已经过去，所以对每个人我都友善有加，像张庚啦、吴祖光啦这些“文革”初期曾经被视为“黑线人物”的老文艺家，我对他们一直都非常尊重，同是“天涯沦落人”嘛。4个月后，我就被第一批分配了。我们几个人的分配工作，给干校全体人员一个吉祥的预兆：我们这些“裴多菲俱乐部”里的文艺工作者国家还是需要的，不会不管了！

从来也没有想到，事隔十多年后，竟然又来到了原中国戏曲研究院这块熟悉的地方！《人民文学》的办公室在二楼。接待我的是副主编刘剑青和负责人事工作的编辑部负责人陆耿圣。刘剑青是熟人，建国前就参加革命并在华北联大学习过，“文革”前在《文艺报》做编辑，写文章常用宋爽这个笔名。那时，我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做研究工作，都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里办公，我们又都住在和平里文联作协宿舍，楼上楼下，经常见面。这次调到《人民文学》工作，首先是得到了他的同意和支持的。陆耿圣是女同志，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民文学》复刊时列入出版局下属单位，所以把她调来主管行政党务。她虽然与我不认识，但对我的到来，也很热情。

《人民文学》杂志复刊于1976年1月，“四人帮”当政时期，袁水拍任主编。粉碎“四人帮”后，领导班子很快就改组了。我调来时，编



(自左而右)柯岩、张秉贵、崔道怡、冰心、王愿坚、王南宁、周明

编辑部设有小说组(组长是涂光群)、散文诗歌组(组长是周明)、评论组。我被分配到评论组。评论组没有组长,领导上让我当组长。组里原有的颜振奋,调到《人民戏剧》去了,我来时只阎纲和吴泰昌二位。他俩“文革”前都是《文艺报》的老编辑,我的老相识。阎纲“文革”前与我住在一栋楼(和平里十区3号楼1单元),他住二层,我住四层。“文革”中,我因文艺黑线问题和苏修特务嫌疑、海外关系等受到单位造反派和街道红卫兵的冲击,被当作“修正主义苗子”揪出来,隔离起来并关进所谓“牛棚”,受到审查和抄家。那时,阎纲、刘茵夫妇多次为我鸣不平,到处替我说话:“刘锡诚算什么走资派?!”在那种乱世之中,儿女亲情都荡然无存,还有人能站出来替我这个在机关里和派出所里都挂了号的人说话,所以我一直铭记在心,一直很感激他们。和吴泰昌虽然没有那样熟,但经过“文化大革命”,凡是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呆过的人差不多都是熟人,况且我们又都是北大出身,做过杨晦的研究生。“文革”中他与我们文联副秘书长阿英的女儿钱小云结为连理的故事,当年在文联大楼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真

可谓是“山不转水转”，经历过乱世之后，我们三个人从不同的方向走到一起来了，能与这两位老编辑老熟人共事，我感到很高兴。唯一使我感到难堪的，是让我来当组长。我对老文学界的人头、情况，都不如他们二位熟悉。我的年纪比泰昌大，政治历练和工作经验可能比泰昌多些，但比起阎纲来可就不行了。阎纲不仅资历高，重要的是他的才华出众，非我所能比肩。我也明白，无非因为我是中共党员，那时他们都还不是党员（顺便附笔于此，他们二位在“文革”中参加群众组织等的审查结论，都是我帮他们做的；后来他们入党，也都是我做的介绍人）。我也就勉强接受下来了。

主编张光年，是老资格的文艺家——诗人和文艺评论家。现在是国家出版局的顾问。在文艺界的老作家评论家中，他大约是最早被安排工作的为数不多的老一辈领导人和文艺名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前夕，他就是《文艺报》的主编。“文革”初期，被中国作家协会的造反派拉下马来，受到群众组织和中央专案组的审查，被扣上“文艺黑线干将”的罪名，并于1969年10月与作家协会两派群众组织以及领导干部一起，下放到了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1年干校开始陆续分配干部，继而咸宁干校被撤销，合并到天津南郊静海团泊洼干校后，他又于1975年10月6日到了静海干校。但他只在那里呆了13天，就于10月18日接到回京通知，文化部留守处遂向他宣布了审查结论（定性为“严重路线错误”），并被安排在国家出版局当顾问。据张光年的日记，他作为出版局的顾问，曾参与了《人民文学》复刊的工作。他在1975年11月20日的日记中记着：“上午偕严文井到（东四）八条《人民文学》编辑部听取筹备工作情况。先由袁水拍介绍同编辑部同志们见面，随后是小会。刘剑青汇报了编辑工作进展情况。卢更生（按：应为陆耿圣）提出了调干、房子、家具等问题。袁水拍、严水井、李希凡就第一期内容各自提出了补充意见。我表示将这些意见向出版局领导及时转达。”^①

1976年10月6日，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大转折的日子。党中

① 张光年：《向阳日记》，远东出版中心出版，第61页。

央一举粉碎了作恶多端的“四人帮”，人民重新获得了光明和自由，万民欢腾。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发现袁水拍与“四人帮”的瓜葛太多了，陷得太深了，于是，袁水拍被免去了《人民文学》主编的职务，张光年走马上任。平常他并不来上班亲政，日常工作由副主编刘剑青掌管。刘剑青在“文革”前就是他的属下，所以他是比较放心的。

编辑部还有一位“四人帮”当政时期从上海调来主持工作的副主编施燕平。我调来编辑部时，他正接受审查，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写交代材料，不讲话。我与他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办公，据我较长时间的观察，听老编辑们的发言，他陷得并不算太深，无非是个忠实执行者而已。审查结束后，调回上海，担任上海大学文学系的主任。

我报到后参与的第一件事，就是刊物上要发表一篇围绕着《人民文学》复刊问题与“四人帮”作斗争的批判文章，指定由吴泰昌执笔、阎纲修改、刘剑青定稿。参与讨论的还有傅活（他“文革”前是中国戏曲研究院的人员，我们算是干校中的战友了！从80年代末起，他先后担任外文局主办的《中国文学》的主编和作家协会主办的《小说选刊》的副主编）和杨筠。通过几次旁听，我明白了大概。“四人帮”企图把《人民文学》办成上海《朝霞》第二。尽管《人民文学》发表了一些不好的、甚至“帮风”很浓重的作品和文章，如转载了《严峻的日子》等，但“四人帮”要完全控制刊物的阴谋并没有得逞，施燕平毕竟也只是个执行者而已。

新闻工作与文学编辑，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专业，我决心尽快地完成思维方式的转换。然而在新华社的工作，毕竟锻炼了我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判断是非、处理应变的能力，使我终生受益良多。我之所以能较快地投入并适应《人民文学》的组稿和编稿工作，与在新华社七年的记者与编辑生涯有莫大的关系。当然与刘剑青和陆耿圣的信任、支持，与阎纲、周明、吴泰昌等同志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编辑文学评论与编辑创作稿件有所不同，更多地体现着编者的思想，因此单靠自然来稿是不行的。提出和确定选题、组织稿件，成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上稿已
6/8

汪老来信，对陈独秀、叶圣陶、
谢冰心等，是史无前例，已转老地主的。
史学上用口实写了汪老陈独秀。

16/7 刘茅盾的信，说他就叫人帮助
查史料的《风波》一稿，已作修改
书分析。

读者(即陈独秀是大忠奸臣法院)王青伟:

- ① 英雄人物与一般人物的辩证关系
- ② 怎样对待历史人物问题。

海南岛别是工厂工人刘光:

- ① 非常革命史实，史实的叙述与不同观点的叙述
 - ② 现在写陈独秀时，陈独秀的叙述与不同观点的叙述
- 陈独秀“三堂会审”史实。
陈独秀革命的工作。(红卫兵攻击史实，及陈
独秀的叙述，陈独秀革命的工作，由史实上
最时写的叙述。

11/7 刘用史实的叙述，说陈独秀革命的工作
陈独秀(革命史实)，结合《暴风骤雨》的
写作)
正常革命史实。说陈独秀革命的工作
问题，他没有爽快承认。

作者 1977 年笔记

1977 年 7 月 16 日，周明(散文组组长)陪我到圆恩寺胡同 3 号茅盾的家里去，向他组稿，请他就“四人帮”攻击鲁迅的《风波》写一篇批判文章。茅盾的司机兼门房把我们领进第一进院的西厢房里。我们坐在沙发上等了片刻，茅盾便从后院的卧室移步而来。他与我们的谈话很谦和亲切，但因他在病中，我们约的文章，他并没有写。

7 月 18 日，我一人到周立波在二里沟宇宙红的家里组稿，请他结合《暴风骤雨》的创作经验，为《人民文学》的“学点文学”栏目写一篇谈创作与生活的文章。那时，周立波刚从湖南来京不久，好像组织关系已经到了文艺研究院，但住的房子却是一幢在“文革”中建起的简易楼，条件极差。周夫人林兰接待我，她是北影的编剧，待我自报家门后，一个瘦高个子的老年人从里间走出来，他就是获得过斯大林文学奖的大作家周立波。过去我没有见过他。他坐在我的对面，很平易地同我交谈，听我的要求。他说“文革”十年，受到关押、批判、游街，很久没有写文章了，对文坛也感到很隔膜了，但他还是答应了我